



■ 走过毕业红地毯,未来的路上是否总有掌声相伴? 周馨 摄

毕业的时候,你们奔向四面八方,然而有多少人,前方的路有梦想照亮?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在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说:“如果没有理想,生活的一切都是苦的。理想语言就是我们深藏于心灵深处的精神源泉,它不断支持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在受到俗事纷扰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滋养生息,重新出发。”

在校园里遇到这些普通的毕业生,谈及未来,有人神采飞扬,有人情绪低落。有梦的青春,流淌着光亮,一时梦碎心不碎,依然眼望着远方。

本报记者 姜燕 文

前方的路可有梦想照亮?

曾经的梦想渐行渐远

顾玉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本科毕业生,1990年出生。今年5月份才找到一份在建设银行当柜员的工作。然而,对这份工作,玉婧的态度并不积极。原因很简单,这是妈妈的意愿,不是她的。

按玉婧的想法,不妨先去企业一试,多点社会经验。上海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曾录用了她,可她和妈妈一说,妈妈立刻跳起来:“怎么可以找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工作?与专业完全不搭界,4年的大学等于白读了。”

今年3月,玉婧曾在一家外企做财务助理,公司承诺毕业后留用她,所以虽然忙,她心里也还是定定的。可到了5月底,公司突然要裁员。玉婧顿时没了安全感,觉得偌大的公司,也是说裁就裁。恰巧这时建设银行的录用通知来了,她也省掉了一份纠结。经此一劫,玉婧也觉得凶险,还是建行这样的单位保险,也遂了妈妈的心愿。至于自己喜欢不喜欢,玉婧说:“总归和专业有关系,毕竟学了4年,我也只有这些知识。”

玉婧的坚持在妈妈那里永远是无力,从填报大学志愿开始。当年,她想报的是环境工程,为环境美化做一份贡献。可妈妈说学金融将来能多挣钱,工作稳定,对结婚也有好处。

她从前也是有梦想的,说起小时候的梦,玉婧脸上顿时泛起光彩。她的画作多次在区、市级比赛中获奖,她最稚嫩的未来之梦,是当一名画家。可儿时的梦想与她的人生渐行渐远。现在,她面无表情地说着未来的生活:“每天对着客户做开户销户的工作,拿着一份能养活自己的薪酬,生活中没有了想象力与创造力,也将失去兴奋感。”

严文韬,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本科毕业生。与他的同龄人相比,他的大学生活更多地是在自主的状态下展开。

因为小时候养过很多动物,喜欢自然与美,所以他选了环境科学。但入学半年多,他就发现真正的环境工程与他所想大相径庭。“当时正好有机会创业,便开始了一个校园社区消费卡创业项目,发展最好的时候,与100多家商户签约,上海有14所大学使用我们的服务。”严文韬说。

创业项目在团购兴起之后淡化,大学二年级,他进入咨询公司实习。“当时只有19岁,是全中国咨询业年龄最小的实习生,一个高级经理看着我,如果他这个年龄就入行,早就是合伙人了,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里。”优秀的实习成绩使他在大四找工作时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了几个比较喜欢的录用通知,他最后选择了北京一家投资公司,寻找互联网行业有潜力的项目投资。

“这是从小喜欢的事情,也和我的创业项目有关,会觉得很好玩,就去了。”他说,虽然从上海去北京,父母有些不太支持,他也犹豫过,但后来觉得不去的话会后悔,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在自己的道路上行走

二十二岁开始追梦,不晚

这天下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工业工程学院的两名女生胡焯燕和陈玉莲在宿舍里闲呆着,工作还没着落带来的恐慌和夏天的炎热一起,煎熬着两人的心。简历投了几十份,通知面试的不多,面试后有回音的一个也没有。“很着急,对未来很茫然。做毕业论文时,想着论文一交掉,就要失业,有一点害怕。”胡焯燕茫然地望着窗外。

她俩都是崇明人,当初报的都是工商管理专业,结果没录上,被调剂到物业工程专业来。事实上,无论是最初的志愿,被调剂的专业还是目前她们求职的方向,都与她们的梦想无关。

“我想当个导游。”胡焯燕说。陈玉莲原来想报设计专业,她从小就喜欢画画,照着动漫杂志上的人物画,谁看了都说好。可报志愿时,父母说工商管理专业好,她听了父母的话。

4年的专业学习,两人说“不排斥,但也不喜欢”。大四找工作,为了不让4年的学习“白费”,两人尽量找专业相关的工业工程师、生产管理、物流管理一类的职位。

陈玉莲说,她这几年一直在想,如果重新选择一次,人生会不会不一样?每次走过学校的艺术楼,看到橱窗里展示的学生设计作品,她总会驻足良久。她说,只要走过那里,心底就会涌起无尽的遗憾。

“不是没有想过再去学设计,和父母老师朋友说起时,他们也认为我学那个挺好。可有时候想,现在学的话,是不是太晚了,追不上他们了?”陈玉莲淡淡地笑笑。

为理想毁约无极限

杨杰,被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学霸”。在被她神往的《中国青年报》录用之前,她签了广州一家知名地产公司,董事局助理的职位,高薪酬高福利。

虽然有着新闻理想,但杨杰在找工作时还是有些看不清,没有只投媒体。今年1月底,与地产公司签约,据说全国只要了10个人,来自全国前10位的高校,待遇很好,包吃包住,住的是五星级公寓,月薪税前16800元,买房还有折扣。

“如果我想去公司,这当然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起点高,能看到很多优秀的人是怎么工作的,能学到很多东西。”杨杰对它不满意的是工作地点在广州,离老家天津太远。

“但公司毕竟不是自己的首选,所以整个寒假都在纠结,要不要与地产公司毁约。”当时她也被上海、北京和江苏几家媒体录用,但均

当老师并非我所愿

张雅迪,1992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毕业生,她将回老家安徽合肥一所初级中学任老师。与很多毕业生不同的是,她是提前批次录取的免费师范生,按照协议,她必须回家乡当老师,否则要缴纳数万元违约金。

当老师,也是一个被动的选择。张雅迪讲起来到这里的原因。“当时高考考得还不错,填报志愿的时候多想一条路,就在提前批次上画了钩。”提前批次里包括师范生和军校,张雅迪并没有仔细想过被提前录取的可能性和后果。她的“家庭志愿”更多地体现在一本、二本和三本志愿上,根据父母的建议,为了今后好找工作,她填报的几乎全是通信企业和电力企业。她个人想当法官,但亲戚说,只有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才好找工作,当法官才“有意思”。张雅迪认为,自己考不上中国政法大学,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雅迪很意外,但也没有办法。做免费师范生要签一个协议,即毕业后前10年里必须当老师。“当时特别痛苦,给妈妈写了一封信。”雅迪说,她在信中和妈妈说,想着人生本来还可以有很多变数,很多选择,但现在未来14年都被限定了,就觉着特别看不到希望。“当时高中有过一次转校,父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被动地来了,现在又要被动地过十几年,而且当老师也不是我想要的。”

雅迪说,班上的同学大都如此,刚来时特别痛苦,时间长了,才慢慢接受了,也对专业渐渐抱有理想。雅迪最后说,她还是希望,将来有一条更符合她的道路可走。

感觉不太理想。

《中国青年报》向杨杰抛出橄榄枝时,已是5月。“从实习时认识的同事那里得知我被录用,当时就好兴奋。”说着,杨杰忍不住又兴奋起来,两天后收到了正式通知,她没有一丝犹豫接受了邀约。

“地产公司发解约函只有15日和30日两天,时间太紧,15日的肯定赶不上了。”杨杰说,她当时人在天津,立即与广州的朋友联系,请朋友亲自将3000元违约金送到了公司财务处,赶上了15日的解约函发放。又让复旦的同学帮她去学校拿三方协议,最后自己奔去北京与《中国青年报》把三方协议签了。

杨杰说:“中青报的收入,招人的时候没具体说,听说不高。但是在不在乎的工作机会间选择时,才会考虑钱,现在这种工作机会,让我去看大门我都去,肯定不会计较钱。”